

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性质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以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最深厚文化软实力的创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活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学习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创造世界社会主义恢宏历史的新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深刻把握现代化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普遍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殊规律的型版。

关键词: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594(2019)01 - 0011 - 05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19.01.02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明确提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这一概括十分新颖,且具有丰富的内涵,正因为如此,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他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这“四个不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不是母版、模板、再版、翻版,那是什么版呢?

一、这场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以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最深厚文化软实力的创版

第一,这场伟大社会变革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基础的,这是我们进行的伟大社会变革的母版。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作为母版,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这就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3]离开了 5 000 年

收稿日期:2018 - 11 - 08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研究”(16JJD71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辛向阳(1965—),男,山东安丘人,信息情报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到我们历史文化的母版上,离开了这一点,很多问题就难以回答;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也必须回到我们历史文化的母版上。我们民族漫长的发展演变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深度,我们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具有极其伟大的创造性。

第二,这场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简单延续。当代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不是建立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而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的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这为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改革成为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他们有着无穷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华民族真正凝结成谁也摧不垮的钢板,凝结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华民族以平等的身份进入了世界民族之列,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能够决定自身的发展,中国的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年内,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不但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超越了母版,孕育出新的生命,这为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奠定了强大基础。

第三,这场伟大社会变革是以母版为基础、进行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的“创版”。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运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和“不患寡而患不均”观念,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思想。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

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4]。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转化成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他指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的“实事求是”,要求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党的历史,要正确地认识党的性质,不能动不动地就割裂历史,或者简单地把革命时期的党称之为革命党、建设时期的党称之为执政党,并加以对立。如果对党的历史和性质做不到实事求是地看待,就不可能开展好党内政治生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做到: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想问题,要敢于同一切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行做斗争;始终站在人民的角度解决问题,要勇于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始终把握工作的客观实际,不能用主观意志、主观想象去代替实际情况的了解;敢于维护真理,更敢于修正错误,一旦出现工作偏差或者失误,就要及时加以纠正,从而避免更大损失。

二、这场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活板

第一,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为指导的。当代社会伟大变革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的变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描绘的蓝图为基本方向的变革。有的人说,中国的改革成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有的人则认为是搞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等。这些观点都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如果搞了什么资本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拉美一些国家的命运,要么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是掉入福利陷阱。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性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我们进行的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的科学原则为遵循的。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

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我们党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生产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我们还根据人民群众需求的重大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次,我们进行的社会改革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不断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尤其要注意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防止由于形而上学思维导致的改革的负面问题。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善于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回答生产力发展如何导致生产关系的调整,进一步回答生产关系的调整如何带来经济基础的变革,再深入回答经济基础变革如何推动上层建筑的改革,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握改革的大趋势。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可以更好地回答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规律及现实路径,使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顺利前行。

第二,这场伟大社会变革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富有生命力的“活版”。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活力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则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历史逻辑的相互结合产生的生机活力。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不断实践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变成活生生的实践。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当代中国的变革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十分肥沃的土壤,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未来社会实现一个联合体,在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变革正在不断创造条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例如,关于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关于经济新常态的思想、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抑制住了自发市场经济存在的弊端。习近平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5]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地持续发展了40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比较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为指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6]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不是自发进行的,更不是漫无目的地走到哪儿算哪儿,是有着极为清晰战略的改革,是路线图和施工图十分清晰的改革,不但有四梁八柱,而且有各种把天堑变通途的宏伟桥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不是零打碎敲式的改革,不是花拳绣腿式的改革,是具有自我革命性的改革,是敢于和勇于自我开刀式的改革,是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

三、这场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学习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创造世界社会主义恢宏历史的新版

第一,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关起门来自我

封闭式的变革,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实践的经验。2014年5月22日,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5]289}历史上和现实中,中国的社会变革都吸收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铁托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探索,创立了“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发展了市场经济,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领导人和多个领域的专家曾纷纷前往南斯拉夫学习取经,借鉴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我们也在不断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会面临共同的挑战,比如,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压力以及普世价值观的传播。彼此之间的相互借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2014年7月22日,习近平在哈瓦那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会谈时指出“中方愿意同古方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党际交流,密切各层级对话磋商,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就治国理政、社会主义建设加强交流,在各自改革进程中相互借鉴、相互支持。”^[7]时隔四年多,尽管古巴领导层进行了更替,但相互借鉴的愿望进一步加强。2018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举行会谈时又指出,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互信、相互支持,经济上互利共赢、相互帮助,治国理政上加强交流、相互借鉴。中国与古巴虽然相隔万里,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彼此联结在一起。2017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习近平和阮富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双方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为各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新活力。

第二,这场伟大变革不是翻版了其他社会主义的模式或者实践做法。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道路,包括照抄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和道路,都不会取得成功,这是社会主义实践100多年历史告诉我们的基本结论。就社会变革的规模、广度、

深度、涵盖的人口数量,以及影响世界发展的尺度而言,中国的变革是任何一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不可能设想去搬来一座“飞来峰”。

第三,这场伟大变革是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世界社会主义光辉历史的新版。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使经济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状态,经济活力充足;非公有制经济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几千万家非公企业和数千万家个体工商户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税收;非公有制经济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这些企业勇于创新创造,为社会提供了很多一流的技术;非公有制经济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它们在很多方面推动了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非公有制经济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推动力。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8]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我们确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实现了国家权力交接的有序性,防止了“码头政治”带来的领导层更替的风险;跨越了单一票选政治的谬误陷阱,防止了“指头政治”;跨越了民粹主义政治的族群陷阱,防止了“街头政治”;使网络空间成为发展民主政治的空间,防止了“摄像头政治”的滥觞;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越来越完善,防止了“空头政治”的存在;跨越了多党政治的利益陷阱,防止了“拳头政治”;能有效地整合各种新的社会群体的政治诉求,防止出现“山头政治”;跨越了非理性政治的幽灵陷阱,防止了“无厘头政治”。

四、这场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深刻把握现代化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普遍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殊规律的型版

第一,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现代化大道。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最为动人心魄的伟大史诗,在书写人类历史恢宏的新篇章。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始终是在人类文明大道上前行的,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进步,以其瑰丽的神姿促动着各国文明的共同发展。有些国外学者指责中国的社会变革背离人类现代化的大方向,说是回到“威权模式”或者是搞“奥威尔式的体系”。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说“到2020年,中国统治者的目标是实施一个奥威尔式的制度,以控制人类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为前提——所谓的‘社会信用评分’。用该计划的官方蓝图的话来说,它将‘让值得信赖的人在天堂的每一个角落漫游,同时让信誉扫地的人很难迈出一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的现代化是要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这种文明成为真正能够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文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通过征信使守信者能够获得益处,使失信者受到惩戒;另一方面,信用体系建设要促进民众权利的提升。而且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信用体系,有信用评级和惩戒,美国也不例外。

第二,这场伟大变革是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普遍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殊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型版。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遵循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比如市场化规律,也就是不断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做得非常成功,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只用了短短26年的时间。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又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就是我们不走扩张主义道路,不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道路,还要保证国家独立性和主权完整性。我们还在深入探索自身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5]159}

“串联式”的发展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进程,实现工业化之后,再实现城镇化,在这一基础上又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最后实现了信息化,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并联式”过程是一个叠加过程,“四化”同时推进。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一直强调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同时强调中国的城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一方面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另一方面,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两条腿走路。2014年3月,新华社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该《规划》分规划背景、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规划实施等8篇,为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之间既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我们既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使乡村振兴有新型城镇化作为强大依托,又可以通过乡村战略的实施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
- [2]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5-05.
- [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234.
- [4]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64.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8.
- [7] 习近平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会谈[N]. 人民日报, 2014-07-24.
- [8] 习近平.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 2016-03-10.

(责任编辑: 刘建明)